

# 慶祝創刊五周年論叢

## 論中國現代化與文化建設問題

徐方正

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必然會遭遇三個基本問題，即由科技差距、民主發展困境和現存國際秩序所造成巨大阻力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足五周歲了！對我們的編委、同事和我自己來說，這五年是一段充滿期望、焦慮、困倦但更不乏欣喜和滿足的日子。無論如何，它絕對不是空白的日子。現在是我們可以歇一下腳步，作些反思和前瞻的時候了。就我自己來說，檢討一下創刊之初所提出來的「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」這個口號也許最有意義。當然，這樣的大題目是不可能有答案的，在這裏我只不過是要提出問題，希望引起討論而已。

### 一 從反方向看現代化

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是救亡，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目標是經濟翻兩番，這兩個目標今天都已經達到了，下一個目標自然就是發展，即實現現代化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。所謂「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」也不外這個意思。這個目標是否可能實現呢？這自然是可能的，最堅強的證據，也許就是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所創造的經濟奇蹟。與東亞有相同文化傳統的中國，按照同一模式發展，已經獲得驚人的成功。似乎沒有甚麼理由它不能夠維持同樣的增長速率，至遲在下一世紀中葉之前追上歐美。這看法自然不無道理——甚至可以

說，頗有說服力。然而，把過去的成功直接引伸到未來畢竟太樂觀了——日本在過去四年的停滯就是一個警告。所以，我認為還應該從相反方向來觀察這個誘人前景，也就是探究可能阻礙它實現的因素。本文主旨即在於此。

要探究中國全面現代化的阻力，必須先正視一些容易忽略，也頗為討厭的事實。首先，所謂現代化，其根本是由科技帶動的經濟發展，至於其他種種變化——社會、觀念、意識等等變化，都是由此所產生。其次，東亞奇蹟的根源在於：二次大戰後，美國聯同英國宰制了西太平洋沿岸地區，並且把它吸納進入由西方主導的環球經濟體系。這令東亞社會的效率優勢(即群體意識、勤奮進取心態等等)得以和西方科技、商業、法律體系結合，從而充分發揮兩者的效力。換而言之，東亞的高增長是依附在西方體系之上的。今日東亞經濟雖已接近西方水平，但後者整體經濟極為龐大，而且科技遙遙領先，所以這情況基本未曾改變。第三，中國在七十年代與美國和解，跟着搞改革開放，這其實在很大意義上也是走東亞四小龍的道路，即加入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。但這一來，它就面臨一個尷尬問題：東亞可以依附西方，中國這樣一個巨人卻不可能長期如此。具體來說，我們認為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必然會遭遇三個基本問題，即由科技差距、民主發展困境和現存國際秩序所造成巨大阻力，以下分別論述。

## 二 科技差距問題

今日有相當人口(譬如超過數千萬)的發展國家和地區沒有不是在科技上相當先進的。顯然，中國倘若要進入高度發展國家的行列，那麼科技水平追上西方是先決條件。這是否可能呢？許多人認為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有極大進步，以炎黃子孫的智慧勤奮，今後只要增加資源，繼續努力，那麼追上西方是不成問題的。但由於下面兩個理由，我卻比較悲觀。

第一，科學的根源是希臘的愛智精神，是對絕對真理的嚮往與追求，它是個人的、非實用性的。當然，現代科技已蛻變為由社會支持，並帶有濃厚功利意味的集體事業。但這只是表象：科技的進步，其實仍然倚靠少數孤獨、拗執、專心追求卓越的探索者。而在那麼講究實際、功利——或者人文精神和民族責任感的中國大地上，培養愛智精神的土壤是極端貧瘠的。而且，我們有個誤解，以為科技發明是勤奮的結果，只要有聰明、有資源就可以依照別人的藍圖「仿製」出來。其實，這些雖然重要，但絕不足夠：因為現代發明其實是劇烈競爭的結果，是長期集中所有有利因素——人材、經費、資訊、設備、制度等等之後，才偶然獲得的突破。歐洲是科技發源地，但喪失領導地位之後就爭不回來了；俄國和日本起步比我們早，下的苦功比我們多，但領先的目標也從未達到。在科技上中國雖然不斷進步，但除非下大決心在心態、制度和基礎結構上尋求突破，否則消除差距恐怕是不容易辦到的。

### 三 發展有效民主的問題

中國目前力求穩定，不輕言變革。穩重不能說不對，但弔詭的是：經濟發展本身就是重大變局，令民主改革成為不可避免。為甚麼呢？民主往往被視為一種理念和價值，一種公平、合理、能伸張正義的社會組織方式，這論者很多，不必重複。但從歷史發展角度看，在英美逐步出現和深化的民主體制，其實更應當視為循一定程序，並根據社會各部分相對勢力，來平衡利益的機制。換而言之，正義就存在於由力量對比所決定的利益分配之中。在歐美社會中，民主的主要功能就是：在大多數人認同下分配社會財富。從這個觀點看，印度、菲律賓、墨西哥、巴西等國家雖然形式上實行民主，它卻不能發揮利益分配功能，所以並未曾建立有效民主制度。我們認為民主是中國當務之急，也正就是因為現代化已為中國帶來了億兆財富，它的分配目前已經導致多方面極其猛烈的衝突，急需一個新機制來加以疏解。

但我們對發展民主的前景也不敢樂觀。民主在中國作為政治理念出現，已經有相當歷史，但發展並不理想，這主要可能是兩個結構性因素造成。首先，中國人向來認為正義和公平可以由個人憑良心、直覺來判斷，而這種頗為主觀的思想習慣是根深蒂固的。因此，中國人爭取民主，大多是激於道義，或者為了政治動員，其目標雖然高昂，但社會基礎則十分狹窄，力量也因此薄弱而不能持久。況且，在中國推行民主還有另一個極為根本的困難：它的超巨規模。民主原則施之於不同大小政體需要不同政治結構：越大越複雜，建構越艱難。迄今人類最龐大而真正有效的民主體制（美國）只有2.55億人口，約等於中國四分之一，而它還是從極小的規模，慢慢成長的。以中國今日之大，憲制與法律傳統之貧弱，要在一代之內構造一個史無前例的龐大民主結構，其困難是絕對不可低估的。

### 四 國際秩序問題

最後我們談國際秩序。在本世紀，中國對西方的態度從抵抗帝國主義，到聯合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抗爭，以至今日的「經貿力求融入國際體系，內政嚴拒干涉」已經經歷了極大轉變。目前中國與西方已經初步建立合作關係，但這種關係卻是以西方的國際秩序為基礎的。這秩序有互為表裏的公私兩重目標：一方面它力圖將西方理念，包括民主、人權、知識產權、自由貿易、環保意識等等擴展到全球，另一方面則力求維護本身利益，這包括施展不公平的關稅貿易手段，建立政經組合和安全體系，以及繼續宰制中南美洲等等。這秩序的推行最近已經引起中美間的嚴重摩擦，在中國經濟力量進一步發展之後，這種摩擦乃至衝突自然只會日益惡化。

問題是：中國除了憑藉實力來堅持己見之外，是否還有其他辦法？過去千餘年間，歐洲一直處於多元政治局面，所以對國際秩序的建立和運用得心應手。至於傳統中國，在大一統格局下只有天朝與藩屬關係，只知道威迫、羈縻、籠絡等手段。在現代國際關係上，這一套權術，是不可能取代既有秩序的。作為人口超過第一世界總和的巨無霸，中國自不可能長期屈從於西方所建立的秩序。因此，唯一出路是爭取建立一個能贏得國際認同的新秩序，否則，自然發展結果必將是衝突增加、秩序崩潰、混亂與不可測情況來臨。中國能夠看到符合但又超越本身利益的另一個世界遠景，並據此提出另一套理念和國際政治規範來，以避免「文明的衝突」嗎？倘若中國沒有足夠的遠見、決心和文化力量來建立這樣一種新秩序的話，那麼它的全面現代化顯然也要受嚴重影響。

## 五 結語：面對客觀世界

「五四」過去已經七、八十年了，這裏所談還是離不開科學、民主、國際地位，恐怕不免顯得非常落伍。的確，不但所謂「啟蒙心態」早已受到揶揄甚至批判，甚至「現代」、「結構」這些觀念似乎也早已經過時，因為，如所周知，我們是處於解構之後的「後現代」。而現代化「不等同於」西化。

當然，從當代哲學和文藝批評發展出來的一套觀念、理論自有其價值、功能和適用範疇。可是，把它們通泛地投射到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——也就是人類文明的整體上去，那就不免產生混淆，不免遮蔽一些我們不可忽視，也不應該忘記的基本事實——例如科技與現代的關係，或者西方在當代世界的宰制性地位等等。也許，這些事實太枯燥，也太討厭了，所以迫使(或者更是誘使)我們藉自我蒙蔽而逃避它們，忘記它們。可是，漠視現實，甚或另自行構造一個「意義世界」來替代它，是要付出代價的。這代價倘若慘痛(例如在大躍進時代)，那固然可怕；倘若它是無形的，令我們逐漸安於中國有發展就夠了，和西方比較是不必要，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觀念，那就更可怕——鐵屋子真已拆毀了嗎？

西方的進步(又一個躲不了的過時詞語)是從接受多元開始的。但所謂多元，並不是「互為主體」，也不是膜拜通天塔，而是痛苦地、緩慢地通過接受現實(包括自然界和其他個體的)衝擊而認識客觀世界，從而令自己的意志成為客觀世界的一部分。這條艱苦而漫長的道路，是中國今後所仍然不能避免的。

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